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滥觞

举世皆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屈原老夫子曾经慨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我们关于中华文明历史轨迹的求索，就从认识它的源头开始吧。

一、大河源头的文明曙光

人类历史的发展由蒙昧时代经野蛮时代而迈进到文明时代，这期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为进入文明时代进行酝酿的时期正是考古学上所命名的“龙山文化”时期。

以分布区域广泛、文化内涵丰富为主要特色的龙山文化，因 1928 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它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有影响的典型文化。考古资料表明，龙山文化已经遍布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区域，在龙山文化以外，其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也扩大了分布范围。这是社会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比过去迅速发展的结果。

考古资料所见新石器时代后期金属器具出现最早的地区多在齐家文化分布的地域。“齐家文化”得名于甘肃广河县

齐家坪遗址，在甘肃以及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广泛分布，其时代约在距今 4000 年左右。齐家文化的制陶业比较发达，当时已掌握了复杂的烧窑技术，这与齐家文化颇具特色的冶铜业的出现很有关系。

认识这些考古文化，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产生有什么作用呢？其作用在于，这些材料告诉我们当时的物质文明进展到了何种程度，让我们能考虑到一种文明的出现应当以物质生产水平的高低为基础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能大家了解得比较多，然而对于文明时代的降临所进行的精神方面的准备，则所知甚少。这就是我们下面所要重点探讨的内容，即通过对于那些个时代艺术、宗教等情况的分析，了解进入文明时代前夕我国境内的远古先民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

我们先来看当时文化观念与原始艺术发展的情况。

在中华文明中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艺术中，用彩绘、雕塑、刻画等手段创造出生动而古朴的动物和植物形象，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色之一。仰韶文化的陶器内壁多绘有鱼、蛙、壁虎、鹿和鸟类的形象。半坡遗址的一个陶盆绘有四只构图简单的小鹿，充满跳跃奔突的情趣。临潼姜寨所出陶盆内壁绘有一只正向盆沿踉踉而行的笨拙的大蛙，瘦弱纤细的腿爪与满背圆斑的肥硕颈腹相映成趣。河姆渡文化的雕刻精细的象牙制品中有双翼平展滑翔飞行的蝴蝶、引吭鸣啼的双鸟，陶塑作品里有略显肥胖的憨厚小猪，陶器往往饰有稻穗、叶子等的图案。当时的他所创造最多的是在人们印象中属于善良、温顺型的动物，它们或比例匀称、或憨态可掬、或色彩艳丽、或鸣啼昂首，总是给人以亲切可爱的感

觉。这个时代，特别是其早期和中期，极少见到凶残、丑陋的动物形象出现在艺术作品中；虽然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饕餮纹之类的狰狞形象，但那是行将来临的新时代的文化在旧时期里的萌芽，从本质上看它并不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东西，对善良、和谐和美的追求才是新石器时代艺术的主题。这与当时人们的原始民主平等观念和和谐、乐观的精神面貌是一致的。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有不少关于女阴崇拜、男根崇拜、男女同体等方面的观念。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遗址发现的一件泥质褐色彩陶壶，上面塑绘裸体人像，为男女同体之像。这种男女同体的情况还见于辽宁东沟县后洼红山文化遗址的一件陶塑。这件作品一面为男性，一面为女性。相传远古时代原为兄妹，后来配为夫妻的伏羲、女娲就是“二神混生（《淮南子·精神训》），为男女同体之神。当时的人们普遍关切人类自身繁衍的问题，各种生育崇拜都是对于这个问题思索的结果。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表明，在中华文明中，舞蹈起源得很早。青海大通孙家寨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彩绘舞蹈图案陶盆，是记载当时舞蹈情况的宝贵资料。这件陶盆的内壁上部画有三组舞蹈图案，每组有五位身材苗条匀称的年轻女子，其身躯稍微倾侧摆动，双腿稍曲，似乎是在准备迈出更为轻盈动人的舞步。每组人物手儿相牵，步伐相同，头上的发辫和身后的尾饰都随舞蹈节奏而向同一方向摆动。

《吕氏春秋·古乐》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这件陶盆上的生动舞蹈形象，简直可以说是原始画家笔下的“葛天氏”乐舞。新石器时代的乐器已经有多种形

制，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郑州大河村和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埙，都是十分宝贵的实物例证。

下面，我们再来看当时的原始宗教的情况，看看原始宗教中所反映的人们的思维发展到了怎样的水平。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萌芽的原始宗教在新石器时代有了较快的发展。原始宗教观念中存在着大量落后、闭塞、愚昧的成分，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思考。对于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迈向野蛮时代的进程来说，原始宗教也有一些历史进步的因素。原始宗教往往和死亡、坟墓相关联，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惟有人人的坟墓才是神的发祥地。他认为如果没有死这事，那也就没有宗教了。从某一个角度可以说，死亡和坟墓是人生的终点，但又是宗教的起点。梁漱溟也认为：“世间最使人情志动摇不安之事，莫过于所亲爱者之死和自己的死；而死最渺茫难知。所以它恰合于产生宗教的两条件：情志方面正需要宗教，知识方面则便于宗教之建立。”

新石器时代的祭祀场所多建筑在山顶上，如浙江余杭安溪乡瑶山所发现的良渚文化的祭坛就建在瑶山山顶，由里外三层组成布局规整的祭坛；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坐落在大凌河西岸山梁正中的突出台地上；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红山文化女神庙也建在山顶。湛蓝的天空以其深邃与浩瀚而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思，将祭祀场所安排在山上，当是人们认为这里距“天国”比较近的缘故。上海青浦

福泉山和浙江余杭反山都发现有良渚文化时期的人们为祭祀而用人工筑成的土山，表现了对“天国”的执著向往。占卜习俗是当时人们对于自然与社会进行探索的一种特殊方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许多遗址都发现有占卜用的甲骨。

对于自然与人类以及宇宙，原始先民很早就有了思考和探索。新石器时代的迷信与科学常混杂在一起而难以区分，在原始的宗教观念中往往有某些积极成分。如果说当时的占卜表现有人们对于自然和社会思考的一面，那么原始巫术则多少含有人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斗争的积极意义。新石器时代的巫术主要有驱除魔鬼、诅咒敌人、比拟模仿等形式，施行巫术者最初可能是氏族内的长者、酋长或其他有威望的人，以后才出现了专门化的巫师。《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上古时代人们驱除旱魃的咒语是：“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认为要让旱魃向北退去，必须首先开挖沟渠。这显然蕴含了人们向旱灾进行斗争的经验。相传上古时代的伊耆氏曾首先倡导举行以祭祀农神为主的蜡祭，还要迎接猫神和虎神，因为它们可以吃掉祸害庄稼的田鼠和野兽。蜡祭时的祝辞是：“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表面看来这是对神灵的祈求，实际上却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整治田地、中耕除草、防涝治虫等农事经验的总结。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绘有地画的房基。地画正中绘有手持棍棒类器物作扑打状的男女两人，其下方绘黑线长方框，框内画两个头形近圆、身躯椭圆的动物。动物头上有向后弯曲的触角，身上有弧线斑纹，下有弯曲长腿和长尾，似为蝼蛄螟蛾一类危害农作物的昆虫。两虫被黑框围住，可能表示已被降服。这幅地画是相当珍贵

的巫师降鬼图。当时巫术所呼唤的神灵的威力实际上是人类征服自然、战胜敌人的能力的曲折表现。这方面的积极意义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古代社会逐渐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迈进，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都随之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这个阶段，许多英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除了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之外，社会观念的变迁也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观念在野蛮与文明之际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

新石器时代前期，人们在自然界面前的自由程度还很低，所以在社会观念中缺乏对于崇高和力量的赞美。当时人们喜爱与自己亲近的动物、植物形象，并用各种手法去表现它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人们在粗犷而可怖的自然现象面前不再只是迷惘和叹息，而是试图去了解它、征服它，对于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人物，大家便十分尊崇。夸父追日、鲧禹治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反映人类征服自然的坚强意志的传说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这个时期的人们所敬慕的是英雄，是比自己更高大、更神圣的东西。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器物上屡见云雷纹、饕餮纹等纹饰，以繁复的回旋纹路突出了神人或神兽的巨眼，在其上的云雷纹中还有神面和双眼，犹如天神在变幻莫测的云雷中俯视人间，其形象处于若隐若现之间，显得非常神秘。良渚文化常见以神人兽面像为主题的纹饰。神人有倒梯形的脸面，重圈形的眼睛，鼻下是布满上下相对利齿的阔嘴，头上戴有高耸宽大的羽冠。神人腹部有巨眼、獠牙的兽

面形象。神人双手直指神兽两眼，似乎只是轻轻一点，就已经将神兽驯服。神人和神兽的形象毫无和善妩媚之态，但却在狰狞与丑陋中表现出一种降龙伏虎般的威力之美。它能使人肃然，使人敬畏。这种对神的尊崇实际上是对人世间权力的讴歌，是对英雄的颂扬。

战争的起源时代是先于阶级与国家的起源的。在新石器后期，关于战争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在新石器时代前期为了复仇而进行的械斗和杀伐也存在，但毕竟数量不多，影响不大，可是在后期，以氏族贵族的贪欲和权势欲为契机的战争却日益频繁。由于战争的需要，武器制造也愈益精良。石峡文化的石钺和石镞，齐家文化的铜刀、铜匕和铜斧，都是典型的杀伤武器。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有石质和骨质的护臂，它们就是防御性的护身武器。新石器时代后期墓葬中，骨架残缺、身首异位、缺臂少腿、首躯不全的现象屡有所见。江苏邳县大墩子大汶口文化墓地发现一具腿部有箭伤的骨架，箭头尚在腿骨中，深达2.7厘米。死者为一中年男子，其左手握骨匕，左肱骨下置石斧，表明其生前是氏族中的武士。残杀俘虏的现象在这个时期也多有所见。龙山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乱葬坑，与氏族墓地正常埋葬者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新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的贵族墓葬往往随葬有斧钺之类的武器，以示其勇武。可见当时人们对于英雄的崇拜也是对于战争的一种颂扬。

就社会面貌而言，城市可以说是文明时代的标识之一。最初的城市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近年在湖南省澧县车溪乡发现有属于屈家岭文化中期的城址，这座城址大体呈圆形，面积约7.65万平方米，由夯土城墙、护城河以及东、

南、北三座城门和城西南部的夯土台基等部分组成，城墙现存最高处达 3 米以上。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王城岗城址由东西并列的两座略呈方形的小城组成，面积约 2 万平方米。呈正方形的平粮台城址，面积约 5 万平方米。后岗城址，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子崖城址，略呈方形，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略呈方形的边线王城址，面积约 4.4 万平方米。这些城市集中在河南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并非偶然，因为这里生产比较发达，地域平坦而便于交易，物质财富和知识文化比较集中，具备了城市形成的条件。作为一种人为的便于人们生活居住的环境，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地区各种活动的中心。它不仅为国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而且使人们的眼光从本氏族投向更大的范围，甚至可以看得见文明的曙光了。

二、步入文明的门槛

纵观人类历史的演进，可以说历史是以加速度运行的。而文明的积累则是历史运行“加速度”的保证。历史正是世世代代的新陈代谢，依次嬗递的结果。

一般都认为，在经历了漫长的远古时代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大约在距今 4000 年左右的时间进入了文明时代，中华文明开始逐渐形成。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国家则是文明社会的象征。中华文明的开端与发展是跟夏朝、商朝和周朝密不可分的。

禹是夏朝的奠基者。从禹子启开始，夏朝正式建立。夏朝共历时四五百年，大约在公元前 21 世纪至前 17 世纪之

间。《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夏朝“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所谓“无王”，是指夏朝初期太康失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东夷族的羿、寒浞先后占据了统治地位，直到太康弟仲康的孙子少康时，夏王才恢复了统治。曾经见到过《汲冢纪年》材料的晋朝人束皙说“夏年多殷”（《晋书·束皙传》），认为夏朝比殷朝的年数要多。他可能是把尧舜的时间都算在了夏朝之内，也可能只把盘庚迁殷以后至纣王的时间算作殷朝年数。

夏王朝时期，氏族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夏王出自姒氏族。夏朝时期有许多方国部落，见于《史记·夏本纪》的就有杞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冥氏、斟戈氏等。《吕氏春秋·用民》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如果说夏朝有几千个方国部落，那还是可信的。夏朝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处于初始阶段，国家也只是雏形，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夏朝与众多的方国部落之间。夏桀亡国的主要原因在于夏朝失去了诸多方国部落的支持，从而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

对于夏王朝的情况虽然我们所知甚少，但它对于后世的深刻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例如，商朝的统治者每以夏的覆亡为历史的鉴戒。汤臣仲虺曾经说：“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丧 [厥] 师。”^①认为夏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夏王矫诬天命而虐待民众，引起上帝憎恶，故而丧师灭国。周朝统治者每以夏为自己的正宗，周人屡称自己为“有夏”。《尚书·君奭》载著名政治家周公的话说“惟文

① 《墨子·天命》中篇引《尚书·仲虺之告》。

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立政》记载周公分析周何以能够灭商的问题，说上天“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周人以夏自称表明姬周族与夏族关系密切，甚至其可能原为夏族分支，所以才对夏表示十分尊敬。《尚书·召诰》载周公之语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认为夏朝“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强调周朝统治者必须汲取夏朝覆灭的教训，才能够长治久安。

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的许多制度、礼仪、文化等不仅具有开辟奠基的意义，而且对于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孔子对于夏礼很感兴趣，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论语·八佾》），以自己懂得许多夏礼为荣耀。相传夏的开国君主夏后启曾经“舞九韶”，对于以“韶”命名的乐舞，孔子十分欣赏，认为它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夏朝的历法称为“夏令”或“夏时”，由于符合天象而历来为人们所沿用，孔子就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相传造车、造酒等技术都是夏朝时期所发明的，并且还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这对后世生产和生活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继夏而起的商朝是由子姓的商族所建立的。据古代文献记载，商的祖先契与舜禹的时代约略同时，可见商也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商在早期是活动在黄河下游北方广大地区的部落，时常进行迁徙，到了成汤时期商族活动在今冀南、豫北一带。大约在前 17 世纪，成汤在众多方国部落的支持下灭掉夏朝，建立了商朝。按照（史记）的记载，商朝共传 17 世，31 王。商朝的覆灭是前 11 世纪的事情。《史记·殷本纪》索隐引《汲冢纪年》说商朝“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与

商朝的实际情况当相距不远。商朝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从成汤灭夏到盘庚迁殷以前为第一阶段，称为早商时期；盘庚迁殷之后至商朝灭亡，为第二阶段，称为晚商时期。早商时期殷都屡迁，商朝都邑先后有亳、囂、相、庇、奄等。盘庚继位以后把都邑从奄迁徙至殷。这以后，商的都邑还可能有过小范围内的移动，也可能出现过两都并存的局面，但大体说来，基本上还是以殷为都邑的。《史记·殷本纪》正确概括了《纪年》的说法，认为“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其说大致可信。

商朝时期王权得到进一步加强。最高君主的名称在夏代多称为“后”，到了商朝则称为“王”。相传成汤灭夏时就以自己勇武为理由，而号称“武王”。《诗经·商颂·长发》记述商的苗裔对成汤的颂扬说：“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灭夏的时候，成汤威风凛凛地站在大旗下，虔诚地拿着大钺，所指挥军队的气势如烈火般旺盛，没有谁能够阻挡。这些诗句塑造了商王成汤的鲜明形象。《尚书大传》说：“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从诸侯之位，三让。三千诸侯莫敢继位，然后汤继天子之位。”由此可见，商王在为数众多的方国部落间具有很高的威望。成汤灭夏以后，曾经做了一篇《汤诰》，其中说“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可见在那个时候“王”的地位已经远在“后”之上。盘庚迁殷之后的晚商时期，王权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后期的几位商王名号在干支字之前往往冠以美称，如康丁、武乙、文丁等，表示商王已经拥有了更加特殊尊贵的地位。商朝最后两位王竟将上帝的“帝”字用于王的名号，称为帝乙、帝辛，直接反映了君权神授的观念。

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商代是我们所知的有确切的、直接的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商朝不仅比夏朝有了更多的发展，而且还表现出更为鲜明的特色。当时以商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比较巩固，商朝成为联系众多方国部落的中心和纽带。而商朝要保持其主导和核心的地位，必须由精明干练、富于经验的强有力的人物来充当商王。当这样的人物在位的时候就会“诸侯毕服”，反之，则“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商王继位不仅有“父死子继”的情况，而且也有不少是“兄终弟及”。“兄终弟及”情况的大量出现，这在其他朝代是罕见的。其原因可能与加强以商朝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的需要有关。商朝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神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方面。殷墟甲骨卜辞的材料表明，当时商朝的统治者几乎是每日必卜、每事必卜，许多重要的军国大事都需要神意来决定。商王武丁及其稍后的时期，人殉、人祭达到鼎盛，大量的人牲被杀掉祭祀神灵，显示了神权的特殊尊贵。对神权的高度重视，在古代社会中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够和商朝相比拟。龟甲兽骨文字是商朝文化的瑰宝。它虽然是商朝神权影响下的产物，但却从各个方面记载了商朝的史实与社会面貌，所以说是极可宝贵的遗存。商朝以后，甲骨文近乎绝迹，因此卜辞材料就成为独具特色的商朝文化的代表。

在氏族对于社会拥有重大影响方面商代和夏王朝时期有着类似的情况。和子姓的商族一样，姬姓的周族也有着相当古老的历史。周的始祖弃是舜禹时代的人，曾被舜任命为后稷。在部落首领公刘的时期，周族居于戎狄之间，公刘率族众迁徙至豳。公刘以后九传至古公亶父，周族又从豳迁徙到

岐山下的周原。这以后周族才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周文王的时期曾经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的兴盛局面，受到多数方国部落的拥护，从而为武王伐纣灭商奠定了基础。大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率众灭掉商朝，成为周朝的开国之君。周朝以平王东迁为分界划分成西周与东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此时社会历史进入了迅速变革的时期。而能够自成体系、稳固发展的还是西周。从周武王开始，西周王朝共历 12 世、13 王。此外，在武王之后周公曾经摄政称王一个时期，在厉王末年有长达 14 年的“共和”时期。西周王朝前后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于公元前 771 年灭亡。

我国上古时代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与国家机构的完善、阶级和等级关系的变化等密切相关。周朝在这些方面由于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的实施而取得重大进展。周朝建立初期，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审时度势，全力推行这两项制度，把周王族成员中尽可能多的人物分封出去建立新的国家。通过分封以扩大周朝影响，行宗法以巩固和提高王权，周朝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究其实质而言，分封制实际上是宗法制的外延。周朝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宗法观念的烙印。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认为周朝文化是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所以丰富而有文采，因此才被赞成。周朝文化、制度进行创新的重要内容就是实行宗法制度。王国维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

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①这个说法很有见地，它精辟地说明了宗法观念下周朝文化的特征。在宗法观念下，周人又提出了“礼”。周公治理天下的关键就是制礼。作为礼仪制度、伦理观念的礼，其起源是很早的，然而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提出来，并把它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准则，则是周朝的事情。与宗法制度、礼等相关联，周人又提出了“孝”、“德”等观念，并使其在周代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制度和观念对于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都要追溯到周代才能弄清楚其源流和实质。

通过以上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说在先秦时代，经过了夏、商、周三代的发展，中华文明已经初具雏形。在这个阶段，中华文明的辉煌成绩不断涌现，甲骨文、青铜文化、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时代起源很早的文化典籍等都是足可骄傲于世的巨大成就。

三、中华文明的形成

西周初年的人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甲骨文“册”字，作绳索穿绕竹木简之形；“典”字作双手捧册之形。甲骨文还有不少以“册”为偏旁的字。这些情况表明商朝以典册书写文字，只是由于典册难以长期保存，所以迄今尚未有商朝的典册被发现。在考古发掘中曾经发现过商代的陶文。这种陶文是在陶器未烧制以前刻画在器表或口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沿部位的。另外，商代的玉、石器上也有文字被发现，晚商后期还出现了不少彝铭。尽管商代在多种材料上书写文字，但是我们今天所见最多的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卜辞。商代甲骨集中发现于殷墟及其附近地区。

丰富的甲骨卜辞材料是我们对于商代社会文明情况进行研究的不可或缺的资料。商代神权兴盛，甲骨占卜是沟通神、人之意的主要方法。属于早商时期的郑州二里岗遗址曾经出土卜骨 375 片，卜甲 11 片，多数经过比较仔细的整治，并以青铜钻做出深而密集的钻坑，其中有两块为刻字甲骨。晚商时期的甲骨占卜臻于鼎盛，甲骨的贡纳、收贮、整治、钻凿、占卜、刻辞等都有严格而系统的制度。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商代甲骨多达 15 万片以上，并且在甲骨上多载有内容丰富的卜辞。据统计，甲骨所见单字为 4500 个左右。甲骨文字错落有序、刻写娴熟，是基本规范化了的初期汉字的代表。甲骨文的许多单字已经能够反映出汉字造字基本规律，今日许多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早在甲骨文的时代就已经趋于定型。汉朝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提出研究汉字形体的“六书”的理论，并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项造字原则和规律举出 12 个字为例证。这 12 个典型字例，除形声字的“江”和会意字的“信”以外，其余都见诸甲骨文。由此可见，甲骨文字确实奠定了汉字发展的基础。然而，甲骨文字毕竟是初期汉字，还存在不少原始性质。甲骨文中象形、指事、会意字占了大部分，作为汉字高级阶段代表的形声字还不到五分之一。相当一部分甲骨文字有大量异体，形体结构比较粗疏，既有大量合文，又有一些一字分成两处的情况。因此，商朝的甲骨文要达到完全

成熟的状态还有相当的距离。

关于周代的直接文字材料虽然以彝器铭文为大宗，但是甲骨材料也有相当的价值。就甲骨文字资料而言，除了殷商甲骨以外，西周甲骨也具有重要意义。带有文字的西周甲骨在山西洪洞坊堆村、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昌平白浮村等地均有零星发现，而 1977 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遗址的发现则为其大宗。在这个遗址中出土带字甲骨 289 片，共计 903 字，另有合文 12 个。后来在周原地区的扶风齐家遗址又发现 6 片，共 102 字。西周甲骨上的文字一般都很小而且字迹纤细，具有颇高的微雕技巧；从甲骨钻凿形态看，西周甲骨多施以方凿，排列整齐而且密集。这些方面都表现了西周甲骨的特征。

足可为商周时代文明表征的除了甲骨卜辞以外，青铜器亦为重要的一项。商周时代，青铜器大量涌现，据粗略统计，仅带铭文者就有四五千件之多。青铜器的铭文和纹饰是商周时代文化特征的一个集中表现。

虽然可以肯定在商代以前已有青铜器出现，但就铸造技艺而言，商代显然是一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的时期。商代青铜器厚重庄严，早期多无铭文，仅有极少数铸有祭祀对象名称，如“司母戊”、“司母辛”等。晚期的铭文十分精致，有多达 40 余字者。这些铭文除了标明族氏以外，还出现了不少记事内容，如祭祀祖先、奖励赏赐、对外征伐等。商代青铜器纹饰主要有云雷纹、饕餮纹、夔纹、虎纹、龙纹、蝉纹、鸟纹、乳丁纹等。在繁缛的各种纹饰中，以张牙露齿的猛兽为母题而衍变形成的纹饰最富特色，多给人以恐怖狰狞的美感。湖南醴陵出土的一件商代铜象尊，以象鼻为注酒

口，以敦实有力的四足为支撑。象的全身布满兽面、夔龙、凤鸟、猛虎等图像，衬托以云雷纹，是一件青铜艺术杰作。

对于我们认识周代文明情况而言，青铜器的重要是不待多言的。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继承了商代的特点，但数量上却大大增加，其纹饰也多富时代特色。这个时期青铜器以兽面为主题的纹饰多富于变化，逐渐抽象为图案，一般只保留其颜面部分，夔龙纹则变化成为短身卷曲的形式，减少了恐怖成分。长尾高冠的凤鸟纹和分尾的长鸟纹比较流行，双身龙纹也在增多。到了西周后期，以威严为特色的饕鬄纹和夔纹趋于被淘汰，出现了窃曲纹、瓦纹、环带纹、重环纹等新的纹饰，纹饰主题倾向于简单朴素。这种情况与西周后期王权的趋于衰弱有一定关系。西周铜器铭文以其鸿篇巨制而著称于世，许多彝铭多达三四百字，最长的《毛公鼎》铭文达 497 字，其重要的内容和详尽的叙事足以和文献中的周初诸诰相媲美。西周时期的许多军国大事，如分封授土、奖赏大臣、征伐献俘、诉讼刑罚、职官任命、地域疆界、馈赠交易等，都被勒之彝器，以示永垂不朽之义。作为社会情况的直接反映，铜器铭文是研讨周代历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不同时期的铭文字体，往往具有特殊风格，或者是首尾出锋、中间肥厚；或者是竖画上下等粗呈玉柱状。西周铜器铭文一般都排列整齐，字体严谨，书写娴熟，优美奔放，是书法和铸造艺术的完美结合。

据推测，在甲骨文字和彝器铭文之外，商和西周时期应当还有不少的简牍文字资料。这些文字资料所载的内容是以历史与文化为主的。史学与文学最初并没有什么区分。原始时代的传说既是口耳相传的文学，又是关于历史的叙述。甲